

# 阿富汗伊斯兰化进程刍议

东方晓

**内容提要** 公元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进入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阿富汗的伊斯兰化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相比，阿富汗地区的伊斯兰教更多地容忍了当地的各种信仰体系。然而，阿富汗的伊斯兰化却是伊斯兰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为伊斯兰教进入中亚、南亚和中国提供了通道，而且抵御了什叶派向东伊朗的扩张，同时，突厥人的伊斯兰化也与阿富汗地方王朝的努力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 阿富汗 伊斯兰化 进程

**作者简介** 东方晓，本名张晓东，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秘书长（北京 100007）。

阿富汗从地理人文方面，都处于亚欧大陆东西与南北的分界线上。在古代，今天被我们称为阿富汗的地区不仅见证了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等古代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也多次经历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以及他们与南方农耕民族的战争和冲突。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第一波扩张降临阿富汗，从此，伊斯兰教逐步成为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压倒性信仰。阿富汗是伊斯兰教进入南亚的通道，也是纵横欧亚大陆数世纪的突厥人完成伊斯兰化的重要环节，同时，在阿富汗地区兴起的地方王朝还顽强地抵御了西伊朗什叶派的扩张与影响。显然，研究阿富汗地区的伊斯兰化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能为我们研究当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提供线索，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20多年阿富汗复杂的国内政治。

## 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传播

公元651年，阿拉伯远征军先后占领赫拉特和巴尔赫，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统治下的东伊朗（今阿富汗西部）落入阿拉伯人手

中。从此，如今被我们称为阿富汗的地区开始进入了伊斯兰化时期。

与阿拉伯人在其他地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征服不同，阿富汗并没有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迅速皈依伊斯兰教。公元651年是阿拉伯人消灭了萨珊王朝的残余势力和占领整个伊朗东部的第一年，但同时也是阿拉伯人在阿富汗第一轮军事征服的结束之年。此时，四大哈里发的统治已近尾声，围绕着穆斯林公社的继承权，不同派别和家族的争斗愈演愈烈，特别是叙利亚的统治者穆阿维叶及其家族与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争斗即将全面展开。显然，穆斯林公社的内部纷争影响了伊斯兰的扩张势头。阿拉伯人在阿富汗的第二波扩张大概始于公元700年前后。当时，倭玛亚王朝派驻伊拉克的总督哈查只·伊本·优素福在削平了发生在巴士拉和库法等地区的叛乱后，先后向东方派出了两支远征军。一支军队从锡斯坦出发，奔袭喀布尔的统治者，以惩罚其抗交税赋；另一支军队在阿拉伯军事将领古太白·伊本·穆斯林的率领下，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对中亚地区的征服。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古太白于公元705年克服了吐火利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于公元706~

709 年征服了粟特的布哈拉及其周边领土, 公元 710~ 712 年克服撒马尔罕 (也在粟特) 和西面的花拉子模 (即现代的基发)。公元 713~ 715 年, 他领导一个远征队, 深入药杀河各省区, 特别是拔汗那 (即费尔干纳——引者注), 他在近代以中亚诸汗国著称的地区建立了名义上的穆斯林政权。<sup>1</sup> 阿拉伯人在东方的两次扩张, 基本上把现称为阿富汗的地区纳入了帝国版图, 但由于缺乏史料, 我们无法判定阿拉伯人的远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播了伊斯兰教。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阿拉伯文献粗略地知道, 公元 10 世纪, 阿富汗的许多居民仍然是“偶像崇拜者”, 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当地的非阿拉伯首领的统治之下。<sup>④</sup> 换句话说, 在经历了倭玛亚和阿拔斯两个王朝的统治后, 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

阿拔斯王朝末期, 帝国的东方各省落入地方军阀所建立的世袭王国手中, 先后控制阿富汗或在阿富汗建立统治的有塔希尔王国 (公元 821~ 873 年)、萨法尔王国 (公元 867~ 1495 年)、萨曼王国 (819~ 1005 年)、加兹尼王国 (公元 977~ 1186 年) 和古里王国 (公元 1000~ 1215 年)。正是在这些非阿拉伯人建立的王国统治时期, 伊斯兰教才逐步完成了在阿富汗的广泛传播, 实现了阿富汗地区的伊斯兰化。其中, 萨曼王朝和加兹尼王朝的统治者对阿富汗伊斯兰化进程作出了最大贡献。

萨曼王国的建立者是巴尔赫附近萨曼地区的大家族, 其祖先原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 后来皈依伊斯兰教逊尼派, 成为阿拔斯王朝维持在伊朗及河中地区统治的支柱性家族之一。萨曼王国在军事上的成就乏善可陈, 因为除了在公元 893 年占领塔拉斯, 萨曼人并未对伊斯兰领地的扩张作出多少贡献, 它的主要军事行动就是镇压内乱、定期骚扰伊朗西部什叶派, 以及与来自费尔干纳谷地的非穆斯林居民的小规模冲突<sup>④</sup>。萨曼人对于伊斯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突厥人的伊斯兰化, 萨曼人建功至伟。萨曼人统治时期, 北方边界相对稳定, 于是, 传教活动代替军事冲突, 成为穆斯林与其他民族、特别是突厥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早期苏非和什叶派的献身精神与萨曼人的鼓励和支持是居住在河中及其周边地区的突厥人伊斯兰化的主要推动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萨曼人是正统派伊斯兰——

逊尼派的积极支持者和维护者, 他们对西伊朗什叶派的抵抗、对内部什叶派倾向的抑制不仅使得逊尼派在阿富汗、中亚等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更重要的是, 它使突厥人也成为逊尼派的追随者, 而突厥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成为欧亚大陆接合部的主导性力量,<sup>1/4</sup> 并最终建立起横跨欧、亚、非 3 个大陆的奥斯曼帝国。其二, 萨曼人不仅造就了波斯文化的复兴, 还使波斯文化成为伊斯兰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的近 300 年里, 波斯语几乎从公共场合消失, 而阿拉伯语则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 任何有所成就的波斯知识分子都习惯用阿拉伯语来表达情感, 正是在萨曼人统治伊朗时期, 波斯文化、特别是波斯语言获得了新生。作为阿拔斯帝国在伊朗与河中地区的埃米尔, 萨曼人努力维持阿拉伯语的特殊地位和哈里发国家的一致性, 但萨曼王国的统治者又对波斯文化传统的复兴满怀渴望, 因此, 在萨曼人时期, “不仅阿拉伯语的学术, 而且波斯语的学术同样受到保护和奖励”<sup>1/2</sup>, 于是, 一批最早用波斯语写作的诗人如鲁达基 (死于公元 940 年或 941 年) 和达奇奇 (公元 935~ 980 年) 等开始出现, 他们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不同地区的方言, 甚至还有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语, 然而, 他们的努力得到萨曼宫廷的肯定, 并且最终为现代波斯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波斯语言的复兴带动了波斯文学的复兴, 而大量有影响的波斯文学作品的面世则使古老的波斯文化焕发了新活力, 从此“波斯文化的传统与阿拉伯文化传统相融合, 波斯文化遗产成了伊斯兰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sup>1/4</sup>

显然, 萨曼王国的历史构成了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一方面, 由于萨曼人的努力, 伊斯兰教不仅巩固了在伊朗东部与河中地

<sup>1</sup> 参见希提著, 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241~ 242 页。

<sup>④</sup> Guy Le Strang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1930, p. 416.

<sup>④</sup> 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 Bernard Lewi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ume 1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46.

<sup>1/4</sup> Ibid., p. 147.

<sup>1/2</sup> 希提著, 马坚译: 前引书, 第 552 页。

<sup>1/4</sup>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42 页。

区的影响力，还进一步促成了突厥人和其他民族的伊斯兰化，从此，伊斯兰教逐步由单一民族宗教转变为世界性宗教。另一方面，通过使波斯古老文化的复兴，波斯文化逐步与阿拉伯文化相互交融，交相辉映，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文明的内涵于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明这种历史性转变不仅使伊斯兰的疆域迅速扩大，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欧大陆腹地众多民族的发展方向和不少地区的文化与政治版图，阿富汗处于这种历史进程的漩涡核心，因此它最直接地感受和见证了伊斯兰教的这种巨大变迁及其结果。

公元10世纪末，萨曼王朝逐渐衰落，它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南的领土由加兹尼王朝继承，从此，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传播进入了逐渐完成的时期。加兹尼王国的建立者艾勒普特勤是一个突厥人，原为萨曼宫廷的突厥奴隶军卫队长，后升任呼罗珊地方长官，由于势力日增而受到猜忌，不得已逃往东部地区，攫取加兹尼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作为突厥人，加兹尼王国的统治者似乎依然保持着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殊秉性，掠夺性的对外战争几已成为加兹尼历代君主的主要政治活动，特别是在麦哈茂德统治时期（公元999~1030年），加兹尼军队曾17次入侵印度，从印度教寺庙中抢劫来的难以数计的财富使加兹尼迅速成为这一地区最富有的突厥人王国。同时加兹尼人又是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依然承认阿拔斯哈里发的宗主权，并有意使自己的对外侵略带有宗教圣战的性质。在向西的领土扩张中，麦哈茂德把维护哈里发的统治地位和打击什叶派的白益王朝作为主要的战斗口号，在对印度西北部旁遮普、拉合尔、木尔坦和信德等地的战争中，麦哈茂德的军队每到一处都把铲除印度教和佛教的神像与寺院作为主要任务，从而为他赢得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伊斯兰君主都羡慕不已的称号——“偶像的破坏者和破坏偶像的正统派伊斯兰教战士”<sup>1</sup>。加兹尼王国所发动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战争不仅使阿富汗境内那些长期维持独立、只在名义上接受和顺从伊斯兰教与阿拔斯哈里发的地方势力逐渐消失，还使印度西北的大片地区永久地变成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势力范围。

加兹尼王国的统治者远不只是打着伊斯兰圣战旗号进行疯狂掠夺的野蛮突厥人，由于长期服务于萨曼宫廷，他们身上还有着深深的波斯化烙印，特别是麦哈茂德，这位连年对外征战、以“迦齐”（“al-ghazi”，征伐者）闻名于伊斯兰历史的人物，实际上还是一个文化事业的热情赞助者和许多天才的穆斯林文人的庇护者。他在都城加兹尼建立科学院，捐赠研究基金，招揽了一大批在当时十分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比如史学家乌特比、科学家比鲁尼和诗人费尔道西等，原本十分偏僻的山城加兹尼成为当时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与艺术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麦哈茂德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费尔道西完成了其不朽的波斯文史诗《帝王记》（Shahnamah）。《帝王记》不仅为波斯民族提供了从伊斯兰兴起前的波斯历史中发现自我和编织民族理想的机会，还为波斯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指示了新的发展方向。<sup>④</sup>

## 阿富汗的伊斯兰化

从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传播过程我们已可粗略地勾勒出阿富汗伊斯兰教的基本轮廓。由于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传播主要是由伊斯兰化的波斯人和波斯化、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推动与完成的，因此，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正统派伊斯兰和波斯文化痕迹。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阿富汗的大部分居民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而组成阿富汗居民的主要民族语言大都与波斯语有关或受其影响，而达里语（阿富汗的法尔西语，字面意思为宫廷语言）一直是使用广泛的官方交流工具。然而，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概括阿富汗伊斯兰教的所有特征，也不足以理解阿富汗伊斯兰教与社会的关系。如果把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看做一幅意境深邃、色彩凝重的油画，那么，逊尼派、波斯文化则是比较浓重的两笔，要真正读懂这幅画，理解其深沉寓意，我们还必须透过表层，了解这幅画的复杂构色和久远背景。

<sup>1</sup> 希提著；马坚译：前引书，第554页。

<sup>④</sup> 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 Bernard Lewis, (ed.), op cit., p. 145.

阿富汗是一个位于亚欧大陆腹部的内陆国家,其北部边界依次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为邻,西部和西南部与伊朗相连,南部和东南部边界则是南亚的巴基斯坦,东北部经由狭长的瓦罕走廊与中国有 75 公里的共同边界。另外,在瓦罕走廊的东南部还有约 120 公里的边界连接着克什米尔。阿富汗国土面积 65.23 万平方公里,其中 80% 为山地和高原,地势大体上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升高,在地理学上属伊朗高原的东北部分,平均海拔约 900~1 200 米。平原约占国土面积的 20%,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北部,但大部分是沙漠和荒原。兴都库什山是亚洲的主要山脉之一,它由东北向西南斜贯阿富汗全境,并深入伊朗境内。兴都库什山东西长约 966 公里,南北平均宽度约 240 公里,海拔高度 4 000~5 000 米以上的高峰在兴都库什山中央到处可见<sup>1</sup>。兴都库什山在东边与海拔更高的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相连,共同组成了一道拱形天然屏障,将南亚、西亚、中亚和中国分隔开来。纵观过去 2 000 余年的欧亚大陆交往历史,这一拱形的天然屏障不仅是希腊、印度、两河流域(或西亚其他地区)和中国等古文明的共同边疆,还是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当然,这一拱形天然屏障不仅仅起分割和阻隔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向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走廊和桥梁:在兴都库什山的北面是突厥斯坦平原和阿姆河冲积而成的平原,通过这里可以直达费尔干纳和里海北岸,并进而沟通俄罗斯与东欧平原。从费尔干纳盆地向东经天山南北两路,就是通往中国的古丝绸之路。随着兴都库什山向西南的逐渐沉降,整个伊朗以及通向两河流域的大道展现在眼前。兴都库什山从东到西有不少山口,它们见证了佛教苦行僧和取经者的虔诚,也目睹了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等所有征服者的野蛮,同时,它们也无数次迎来和送走了那些往来于中国、印度和伊朗之间的不知疲倦的商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富汗是欧亚大陆不同民族与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

特殊地理位置和险要地势造就了阿富汗独特的社会与人文禀赋。

1. 阿富汗种族的多样性。 据估计,现代阿富汗的居民分属于 21 个民族,但实际上民族

构成可能要更为复杂。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曾经进入阿富汗,并在其历史中留下印记与痕迹的民族有印度-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大月氏、贵霜、帕提亚和 哒。伊斯兰教兴起后,进入阿富汗的有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 3 000 多年中,还有许多不曾在历史中留下踪迹的民族访问过阿富汗。在进入阿富汗的民族中,有的在阿富汗建立了显赫一时的统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不过是匆匆过客,很快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还有不少人留在了阿富汗与世隔绝的高原峡谷和崇山峻岭之中,与那些比他们先到的居民融合在一起。由于缺少可信的文字记载,阿富汗各民族的起源、交往历史已成为难解的文化人类学之谜,即使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其种族起源和历史演进过程也是充满疑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数千年历史中,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既是欧亚大陆各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各民族交流与融合之所,阿富汗境内复杂的种族构成和犬牙交错的人口分布就是这种民族迁徙与交往的结果与见证。

2. 阿富汗文化传统的多元性。 从古代起,阿富汗所在的地区就受到欧亚大陆几大文明板块的交互影响,我们虽然不能详述各种文明在这里传播和交融的图景,但不少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多少能给我们勾勒出一些重要的文化类型在阿富汗存在与发展的轮廓。历史上最早进入阿富汗地区、并在阿富汗建立长期统治的入侵者是起源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特别是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 522~486 年),阿富汗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包括现在的赫拉特、巴尔赫、喀布尔、贾拉拉巴德、白沙瓦、坎大哈、奎达和锡斯坦等地,被划分为几个总督区,纳入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版图。该帝国在阿富汗的统治使阿富汗开始了祆教化时期。接替该帝国在阿富汗统治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于公元前 330 年进入阿富汗地区)及其在亚洲的继承者塞流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从此,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开始了长达约 200 年的希腊人统治时期。与此同

<sup>1</sup>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

时,孔雀王朝(公元前324~184年)在印度崛起,它与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在阿富汗展开了激烈竞争,并最终取得了阿拉霍西亚(“Arachosia”,今坎大哈和奎达等地)和犍陀罗(“Gandhara”,今喀布尔、贾拉拉巴德、白沙瓦)等阿富汗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控制权。孔雀王朝在阿富汗一些地区的统治使得佛教在阿富汗大行其道,一直到伊斯兰教兴起以前,佛教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阿富汗占据压倒性优势。公元7世纪中,唐王朝和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分别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崛起。这两大力量之间并未发生大规模冲突,然而,他们的崛起却在欧亚大陆腹地引发了改变历史发展方向与进程的力量整合,那就是从西到东的伊斯兰化和从东到西的突厥化。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在伊斯兰教和突厥人的共同影响下,使中亚这部分地区内昔日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sup>1</sup>,阿富汗正好处于这种力量整合的接合部,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它的历史发展与伊斯兰教和突厥人这两种因素联系在一起:除了阿拉伯人的短暂直接统治外,阿富汗成为伊斯兰化的波斯人、特别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领地。

### 3. 阿富汗社会变迁的突然性和颠覆性。

如前所述,阿富汗既是欧亚大陆一些大帝(东西之间)的力量交汇点,又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和征服者的走廊与通道。由此我们看到,在数千年历史中,除了极个别时期外,阿富汗所在的地区大多处于连年征战和突发性外族入侵的状态之中,阿富汗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等都显示出极强的不稳定性。如阿契美尼德的占领使祆教文化在阿富汗广为流传,而亚历山大的入侵则使阿富汗许多地区又成为希腊化的世界,随着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佛教在阿富汗大行其道,当阿富汗沦为阿拉伯人的领地后,伊斯兰教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外族入侵还有极大的破坏性,特别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于其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夺与抢劫,因此,几乎每次草原民族的入侵都给阿富汗带来毁灭性灾难。122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远征军渡过阿姆河,开始了对阿富汗的战争,蒙古人所到之处可谓下一城、屠一城,他们不仅拆毁城池、

杀害居民,甚至毁掉阿富汗人世代耕作的农田和极其脆弱的灌溉系统。正是在经历了蒙古人的占领之后,“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sup>④</sup>。经常发生的外敌入侵,使得任何民族和文化在阿富汗的长期存在都变得极为困难,更谈不上不同民族与异质文化的创造性融合与繁荣兴盛,一种可称为“取而代之”的民族与文化承继模式成为阿富汗地区民族与文化关系的主流特征。由此我们看到,阿富汗曾经有幸接触或拥有欧亚大陆最先进的文明(如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然而,阿富汗人却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清楚过去哪怕是300年的历史。对于阿富汗来说,即使是最辉煌的文明也不过是“过眼烟云”。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大规模社会变迁、特别是外力推动的社会变迁成为阿富汗历史演进的重要形式。由于外部的推动力经常表现为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持久的帝国争夺战,因此,阿富汗社会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往往是突发的、颠覆性的。

## 结 束 语

阿富汗的伊斯兰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阿富汗的伊斯兰化并不彻底。一方面,伊斯兰教确实成为这一地区居民的主要信仰,然而,旧信仰体系的某些片断仍然深栽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于是,伊斯兰教不得不与其他宗教分享阿富汗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阿富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积淀比较薄弱,而且地处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因此,阿富汗地区的宗教人士不得不从中亚、南亚的宗教学校和清真寺寻找最新的知识与变革的灵感。

也正是缘于此,阿富汗历史上很少出现基于宗教信仰的狂热与迫害,同时也对外来的人和思想满怀宽容。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进入,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邢永平)

<sup>1</sup>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9页。

<sup>④</sup> 同上,第311页。